

长/征/文/化/研/究/丛/书

Changzheng jingshen yu
Zhongguomeng

长征精神 与 中国梦

张勇 杨实生 周明 编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Changzheng Jingshen yu
Zhongguomeng

中国梦

长征精神与

张勇 杨实生 周明 编著

长征文化研究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基地项目(14JJD71003)资金资助

贵州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遵义师范学院红色文化研究中心资金资助

贵州省长征文化研究与传承2011协同创新中心资金资助

遵义师范学院与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科研基金课题 (WJ2013022)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对长征历史的回顾和科学总结,在深入挖掘长征精神的形成、内涵、作用等基础上,密切联系“中国梦”提出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将长征精神融入到实现中国梦的具体实践之中,分析了长征精神与实现中国梦的历史渊源和内在逻辑,阐释了长征精神对于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利用长征精神助推中国梦实现的路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征精神与中国梦/张勇,杨实生,周明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667-1349-0

I. ①长... II. ①张... ②杨... ③周... III. ①爱国主义教育—中国 IV. ①D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0866号

长征精神与中国梦

CHANGZHENG JINGSHEN YU ZHONGGUOMENG

作 者:张 勇 杨实生 周 明

责任编辑:全 健

印 装: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16开 印张:12.25 字数:220千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67-1349-0

定 价:38.00元

出 版 人:雷 鸣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822559(发行部),88823547(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437291590@qq.com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总 序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中央党史研究室组建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的研究同盟，由复旦大学、嘉兴学院、湘潭大学、井冈山大学、赣南师范学院、遵义师范学院、延安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八所高校组建而成，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设立研究中心，“旨在发挥高校优势，整合各方面力量，推动实质性合作和协同创新，形成党史、革命精神和文化资源的研究联盟，建设党史和革命精神研究的高地、革命传统教育宣传的阵地和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智库，为学习研究宣传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革命文化，挖掘中国共产党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促进革命文化的传承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教育部办公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公厅《关于设立“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的通知》）。

遵义师范学院研究中心着重研究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长征及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探索过程中积淀的革命文化资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长征精神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精神特质，传承和发展了民族精神，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精神力量，是铸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内涵。长征精神凝聚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是我们党和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研究长征及长征精神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贵州是中央红军在长征期间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之一，有着丰富的长征文化遗址，为研究长征精神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长征文化是贵州最亮的文化品牌之一。江西宁都是长征的起点，贵州遵义是长征的转折点，陕西延安是长征的终点，贵州遵义在长征中具有承上启下、历史转折的重要作用。贵州有两条红色旅游线路被纳入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中的30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行列。早在2004年，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黔西红色旅游区”就已经是全国12个重

点红色旅游区之一。进行长征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的研究，对于挖掘整理、保护与利用好这一珍贵的文化资源，使精神财富转化为物质财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带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遵义师范学院位于有“转折之城”美誉的革命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市，是一所拥有百年师范传统的高等学府。学校注重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的研究与传承应用，在长征文化的研究、传承与应用方面形成特色。学校通过理论研究、项目申报、学术交流、文艺汇演、课程设置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始终将以长征文化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融入对学生的教育教学全过程，以及学校建设、发展的过程与目标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我们陆续推出的长征文化研究等系列丛书，即是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依托，结合基地专家学者的研究特长，整合力量，发挥优势，传承和弘扬长征文化的体现。

王 刚

2017年9月

目次

第一章 长征精神的形成与内涵	1
第一节 长征精神的形成	1
一、长征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1
二、长征精神是长征的必然产物	7
三、长征精神的成因	9
第二节 长征精神的凝练与传播	15
一、长征精神的提出与早期概括	15
二、长征精神的凝练与升华	18
三、长征精神的传播	21
四、国外对长征精神的研究与传播	24
第三节 长征精神的科学内涵	28
一、崇高的革命理想, 坚定的革命信念	28
二、勇往直前、气吞河山的英雄主义气概	29
三、无私无畏、饮苦若饴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30
四、紧密团结、顾全大局的精神	31
五、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32
六、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33
第二章 遵义会议: 长征精神形成的关键节点	35
第一节 遵义会议形成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精神	35
第二节 遵义会议形成了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精神	41
第三节 遵义会议形成了理想高远、信念坚定的精神	47
第四节 遵义会议形成了发扬民主、纠正错误的思想	51
一、发扬民主	51
二、纠正错误	55

第五节 遵义会议形成了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精神	58
第六节 遵义会议恢复确立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精神	59
第三章 长征精神的历史作用	64
第一节 长征精神对于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意义	64
一、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是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64
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是长征胜利的动力	66
三、紧密团结、顾全大局是长征胜利的保障	67
四、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长征胜利的法宝	68
五、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将士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结晶	70
六、严守纪律是长征胜利的必要条件	72
第二节 长征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成功的精神引领	73
一、长征精神是对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精神引领	73
二、长征精神是对中国革命事业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引领	75
第三节 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的地位 and 作用	79
一、长征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基本内涵是一致的	79
二、承前启后的长征精神	82
第四章 长征精神与中国梦的历史渊源和内在逻辑	88
第一节 长征精神与中国梦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	88
第二节 长征精神与中国梦都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科学认识 基础之上	91
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91
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92
三、团结互助的合作精神	93
四、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精神	94
第三节 中国梦是长征精神的时代升华	97
一、长征精神与中国梦都诞生在共同理想的旗帜之下	97
二、长征精神与中国梦都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	99
三、长征精神与中国梦都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	100

第四节 实现中国梦是长征精神的最高价值目标	103
一、长征始终与民族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	103
二、长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准备了力量源泉铸就了“钢铁长城”	104
三、长征使中华民族真正走向重新振兴的道路	107
第五章 深化改革时期继承与发扬长征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09
第一节 长征精神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	109
一、长征精神的时代性	109
二、长征精神的求实性	112
三、长征精神的创造性	114
第二节 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是新时期培育民族精神的需要	116
一、长征精神培育了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117
二、用长征精神中的自强不息铸就当今的民族精神	118
三、培育新时期的民族精神需要发扬长征时期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精神	119
四、新时期必须培育爱好和平、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	120
第三节 大力弘扬长征精神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保障	122
一、弘扬长征精神贯彻民族平等团结原则以促进民族和谐	122
二、弘扬长征精神尊重与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以促进民族和谐	125
三、弘扬长征精神践行民族自治以促进民族和谐	126
第四节 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对于继续深化改革的深远影响	128
一、弘扬长征精神坚定改革必胜信心	128
二、弘扬长征精神凝聚改革力量	129
三、弘扬长征精神战胜改革路上各种困难	131
第六章 长征精神对于实现中国梦的独特作用	133
第一节 长征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133
一、长征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力量源泉	133
二、长征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铸就了敢于创造的精神	135
三、长征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凝聚了向心力	137

四、长征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注入了实干精神	138
第二节 长征精神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思想基础	140
一、长征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开创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 思想先导	140
二、长征精神恢复并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	142
第三节 长征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保证	146
一、长征精神形成了实现中国梦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146
二、长征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准备了成熟的指导思想	149
三、长征精神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证	151
第七章 用长征精神托起伟大中国梦	153
第一节 弘扬长征精神,增强使命意识	153
第二节 弘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59
一、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159
二、坚定理想信念,永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162
三、坚定理想信念,永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64
第三节 弘扬长征精神,提升群众观念	168
一、筑牢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	168
二、强化宗旨意识	170
三、做好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173
第四节 弘扬长征精神,锤炼创新意识	176
一、克服习惯心理和迷信心理,培养创新意识	178
二、增强捕捉机遇、灵感的能力,培养创新意识	179
三、克服恐惧心理,培养风险意识	181
参考文献	183

第一章 长征精神的形成与内涵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人民共同书写的一部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冲破国民党中央军、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和少数民族反动土司、头人部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经受无数折磨考验，战胜党内分裂的严重危机，终于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六万五千余里（各路红军行军总里程）的长征。正是在长征这一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等，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途中锤炼熔铸出的长征精神，也将彪炳千秋，成为党和人民源源不断的精神财富。

第一节 长征精神的形成

长征精神脱胎于优秀民族精神，产生于长征的伟大实践，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融合的产物。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中爱国主义、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等精神品质为长征精神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艰苦卓绝的长征，使中国工农红军在血与火的淬炼、苦难与忠诚的考验中，锻造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崇高的意志品质、坚定的政治信仰、严明的政治纪律、求真务实的政治作风等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高尚精神。因此，长征精神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优秀民族精神，又在伟大的长征实践中进一步升华，深刻地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高度融合。

一、长征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从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连续四次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在根据地军民的奋力抵抗下，国民党的“围剿”企图均告失败。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更改作战方式，调整作战部署，而此时的中央苏区受

“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王明、博古两人掌握党中央的领导权，军事部署全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作为一名德国外籍顾问，李德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战争的部署特点并不了解。他们违背了苏区的实际情况，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生搬硬套苏联的军事战略战术。^① 四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朱德所坚持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博古、李德采取的进攻冒险主义。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中央苏区即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反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军。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下，军事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陷入被动地位，屡战不胜，损失惨重。^②

广昌，作为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军事战略地位不言而喻。1934年4月蒋介石部署重兵围攻广昌，李德依旧坚持“全线出击”，集九个师的兵力誓死保卫广昌。然则战况不尽如人意，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岌岌可危。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红军主力转到外线作战，以应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但该建议并未被中央采纳。战况急转直下，打破第五次“围剿”已几无希望，实行战略转移成为当时唯一的出路。1934年10月，战略转移所必需的准备尚未完成，李德、博古猝然决定离开江西中央苏区，长征仓促开始。长征开始后，原来犯有“左”倾错误的博古、李德，在实行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的错误。^③

国民党军队穷追猛打，在“追剿”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部署了粤军、湘军、桂军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进行堵截。为保留革命火种，红军方面拼死突破蒋介石部署的四道封锁线，但所付出的代价极为沉重。值得一提的是第四道湘江封锁线，由于湘军和桂军之间的嫌隙，湘江防线曾出现一个缺口。1934年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为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突破封锁线创造了极佳的机会。但由于部队行军速度过慢，待中央机关赶到渡口已是两日之后，此时界首已受到飞机的猛烈轰炸，湘、桂两军也已成夹击之势，战况极为不利。无奈，固守渡口的红军为掩护其他部队渡江，拼死坚守，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截止到12月1日，中央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在东岸全部牺牲。湘江战役成为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

①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② 马新发、雷莹主编：《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③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突破蒋介石的四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的人员已损失过半，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仍坚持死拼硬打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这个决定可能招致整个中央红军的覆灭。革命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暂时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发展壮大革命队伍。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红军转而进击贵州黎平，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向贵州进军。经过短暂休整，中央红军重整旗鼓，于1935年1月初强渡乌江天险，摆脱了蒋介石部署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会上多数人同意他们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在会上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①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纠正了“左”倾的军事路线错误，撤换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历史转折，在极端危险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从此，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中国革命力量逐渐壮大，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掌握了军队的实际领导权，中央红军一改以往死板的行军作战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灵活的运动战、游击战。贵州地区，山地众多，毛泽东利用地形地势的变化，灵活机动地部署调配兵力，中央红军好似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变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更让蒋介石感到扑朔迷离，敌军恰似被中央红军牵着鼻子走，疲惫奔波于四川、贵州边界。1935年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慌忙将云南部队调来增援。毛泽东早就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② 果不其然，滇军一出，中央红军即刻奔袭云南，昆明岌岌可危。云南当局仓促调集兵力守卫力量空虚的昆明，金沙江的防务顷刻削弱，毛泽东率领

^①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② 蒋风波、曾庆洋编：《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中央红军迅速掉头向北。5月9日部队急行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蒋介石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部署的围追堵截封锁，金沙江一役成为战略转移中最具决定意义的胜利。

渡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到达四川境内，计划在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过江，大凉山地区则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经之地。四川大凉山属于少数民族彝族聚居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在小叶丹的帮助和协调下，大凉山其他彝族部落均表示保持中立，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少数民族地区，顺利到达安顺场渡口。大渡河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红军仅有十七名战士作为先锋强渡成功，经过几番尝试，中央红军大部队仍无法从安顺场渡口过江，因此中央红军转而急行军，直取金沙江上游的泸定桥。三百四十里的行程，中央红军仅用两天时间完成。此时敌军尚未完全破坏泸定桥，顶着泸定桥敌军密集的火力攻击，红军战士攀缘桥上铁索，突击冲过泸定桥，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随后中央红军并未做长久停留，紧接着就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高约4114米，属于邛崃山脉，藏语称之为“甲几”，意即“山峰陡峭”。这里山岭连绵，重峦叠嶂，危岩耸突，峭壁如削，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是对夹金山恶劣环境的真实写照。不少红军战士都出现了头晕眼花、耳鸣乏力、行走困难、难以入睡等症状，更有甚者腹胀呕吐、胸闷气短、面部水肿，七十多里的路程，有些人坐下休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见到在此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接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都出席了大会。

会师大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召开，主要商讨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将在何地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中提出：新根据地需要具有三个条件，一是地域宽大，好机动；二是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三是经济条件较好。结论是应该去“川陕甘”。^①会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通过这个战略方针。6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提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我们

^① 俞海洛、王献岭：《八十年的历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兵力达十万，红军实力大大增强。但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自恃掌握八万重兵，个人野心逐渐膨胀，对于两河口会议作出的北上决定并不认同，暗中秘密酝酿南下四川、西康边境地区。8月3日，依照《夏洮战役计划》红军一分为二，划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1935年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大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穿越大草地的途中，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磅礴，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稍有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红军右路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冻馁交加，体质已十分虚弱，很多人牺牲在草地中。右路军走了六天六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而此时张国焘却不愿北上。9月9日张国焘发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提出种种借口要求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时任右路军参谋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刻报告给了毛泽东。为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和分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继续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北上方针，连夜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由于事发突然，红四方面军部分干部不明真相，曾主张武力拦截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力排众议，坚决制止红军内部的冲突行为，为维护整个红军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9月10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但张国焘对于中央敦促其率部北上的决定仍旧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②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193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北上至川甘边界腊子口，这里被喻为天险。红军先锋部队不畏艰险，攀登悬崖陡壁，出其不备袭击了国民党守军，拿下腊子口，部队进入甘南开阔地带。27日，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

^② 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49页。

会，鉴于陕北地区有相当数量的红军，陕甘支队决定前往陕北，并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同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的长征，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

张国焘坚持南下，并于1935年10月5日公然同党中央决裂，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他们一千人等不厌其烦地对受骗的指战员们做思想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左路军在与敌人作战中伤亡过半，到四月间仅余四万多人，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径，红四方面军广大战士并不认同。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即刻撤销另立的“中央”，重新北上。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在这年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①

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原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活动，受中共中央指示，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县开拔北上，历经千难万险，最终于1936年7月2日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由于红二、六军团人数较少，中共中央商讨决定将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至此，红军仅剩张国焘左路军仍在南方地区，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支持之下，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同意北上会师。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红军从1934年10月离开南方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历经两年时间。英勇的红军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毅力，走过闽、赣、粤、湘、桂、贵、川、滇、藏、甘、陕十一个省，经过了汉、满、壮、彝等两亿人口以上的不同民族地区，徒步行走两万五千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长征的胜利，保存了党中央和革命的骨干力量，使我国革命事业化险为夷，使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地区，开拓了革命发展的大好局面。经过长征，红军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从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到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三

^① 王曙新等：《中国共产党历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万人左右，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精华。^①毛泽东说：“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了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②

二、长征精神是长征的必然产物

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诗篇，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在长征过程中形成的，是长征的必然产物。^③

第一，长征精神是在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形成的。在长征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对红军长征的围追堵截主要是在红军已到或可能前去的地区，凭借天险，布置大军，前堵后追，四面包围，合力夹击，妄图将长征红军分别歼灭。在此过程中，他们集结了中央军、湘军、粤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西北军、东北军、宁甘青的马家军及其他部队，真可谓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为了达到围歼红军的目的，蒋介石再次采取在第五次“围剿”中起过作用的碉堡政策，在赣、湘、黔、滇、川、康、陕、甘等地大筑碉堡，沿线封锁。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借重地方军阀的势力，让各省军队打头阵，以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削平地方势力的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效果。^④他们这一套战略战术，的确给长征中的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特别在湘江东岸及川康边境曾使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川黔边境也使中央红军未能达到渡江的目的。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采取了高度机动的作战形式——运动战，声东击西，迂回曲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反而弄得国民党军队处处挨打，疲于奔命。最终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堵截，顺利到达了陕北。

第二，长征精神是在同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中形成的。回顾长征，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当年红军指战员长途跋涉，征服千难万险的情景。这支铁流，翻越了空气稀薄、终年积雪的重重高山，穿过了人迹罕至、沼泽遍布的茫茫草地，跨过了激流汹涌、难以渡越的条条江河，吃草根，咽树皮，忍寒冻，历尽了人间的艰辛。尤其使人难以忘记的是，一些年近花甲的老同志，拄着拐

① 李安葆：《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407页。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

③ 李军民主编：《中国当代精神概论》，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④ 李军民主编：《中国当代精神概论》，陕西旅游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棍和大家一起行军作战；一些稚气未脱的红小鬼，也同成年战士一样，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一些老炊事员，为了给大家寻找山果野菜充饥，误食毒菌而牺牲；女战士承受着更多的生理心理困难，却也跟男同志一样迈着坚实的步伐向前进发。红军长征中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人间少有的，也是战争史上罕见的，更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①正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长征精神。

第三，长征精神是在同王明教条主义、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中形成的。长征是在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情况下进行的。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最初的两个多月，由于博古、李德继续顽固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竭力排挤毛泽东同志，实行“搬家式”退却逃避主义，结果又造成重大损失。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党中央于1935年1月通过遵义会议英明果断地结束了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方针，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1935年6月12日，在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方针上，张国焘与党中央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中央提出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却要南下，在川康藏建立根据地。中央明确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是一个团结“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能够成为“散布革命种子到全国去的发源地”，“以此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②中央的北上方针，是从整个民族利益出发的，目的在于使红军转移到抗日的前沿阵地，担负起推动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重任。张国焘对当时政治形势作了“左”倾保守估计，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了自己的力量，对红军在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丧失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地区退却。这实质上是使红军远离抗日前线，逃避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责任。对此，中央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和耐心等待，张国焘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不顾张国焘搞分裂带来的困难，毅然率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

^① 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伏晓春、李义主编：《世纪丰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4页。